

外论摘要

当代美国人口经济界
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论争

于学军 黄琳

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期,当时的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是不断增加的。到20世纪初,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开始加速,并在60年代达到高峰。自从1950年以来,世界上85%的新增人口都产生在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预测的中位方案,一个世纪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比重将由现在的76%上升到88%^①。

面对这种急剧变化的局面,人们开始担心全球的经济和生态是否有能力支持这种增长。有些人认为,人口增长不仅对经济发展是个威胁,而且对人类的延续也是个威胁。另一些人则认为,人口适度地增长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和技術革新。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人口增长是一个问题,但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由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也往往相距甚远,这样,一场全球范围的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论争开始了,并越来越成为人口学研究的热点问题^②。当代美国人口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悲观派”与“乐观派”之间展开的,论争的焦点还是马尔萨斯以来的老问题,即人口增长的社会经济后果。

当代美国人口经济学界对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最早进行比较全面系统且具有开创性研究的,当属安斯雷·科尔和爱德加·胡佛在1958年合著的《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该书以印度为例证,集中论述了人口增长及有关的扶养负担对物质资本构成比率的影响。他们以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印度经济的发展模型。通过计算,他们发现,30年后,在高出生率假定下的印度人均收入将比低出生率假定下的人均收入低40%,因而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消极作用^③。

科尔和胡佛的著作发表以后,他们的模型中许多假定条件遭到了批评。第一,很多实证研究表明,高生育率与储蓄下降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第二,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本身也遭到了疑问。第三,经济学家指出,人口增长的确有一些好处,如刺激投资的需求和技术的进步。尽管有这些批评,他们的观点仍然在世界上十分流行。例如,美国科学院于1971发表的《快速的人口增长——后果及对策》一书就得出了与科尔和胡佛相同的结论,所不同的是,这部著作是从人口增长对人力资本构成的影响来描述人口与经济的关系^④。

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局

①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90》, UN, 1991.

② “当代人口学中研究的‘热点问题’”,载《中国人口报》, 1989年9月15日。

③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A Case Study of India's Prospects》, A. Coale and E. Hoover, 1958.

④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71.

面,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能源危机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世界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却由于生育条件的改善和死亡率的下降而迅速增长。面对这种形势,以埃利奇和麦多斯为代表的“悲观派”产生了。他们相继提出了“资源耗竭论”,“人口爆炸论”等悲观的论点。特别是麦多斯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在世界学术界和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这部著作中,麦多斯指出,世界人口和经济若按当前速度继续增长下去,不久地球上的耕地就会绝对不足,粮食严重短缺,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将超过人类所能忍受的限度,人类可能遭到毁灭,因此,人口和经济都必须零增长^①。

1980年,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也发表了《地球2000年——给总统的报告》一书,书中同样充满了悲观的论调^②。

“悲观派”的观点刚一出现,就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在与“悲观派”的论战中,逐渐形成了以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康恩和该所研究人员布朗、马特尔以及美国依利诺斯大学朱利安·西蒙为代表的“乐观派”。

康恩在他的《下一个200年》中,从时间序列上分析了人口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他认为,在200年前的1776年,世界总人口为7.5亿,总产值为1500亿美元,人均产值为200美元。到了1976年,虽然世界经济仍然存在种种问题,世界人口也增加到了41亿,但世界总产值已高达5.5万亿美元,人均产值1300美元。与1776年相比,人类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改善。而到下一个200年,世界总人口将达到150亿,总产值将达到300万亿美元,人均产值将达到2万美元。到了那时,人类的生活将是富裕而美好的^③。

在“乐观派”中,西蒙的研究成果最系统,最富有挑战性。1977年,西蒙出版了《人口增长经济学》。在这部著作中,他运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人口增长有助于创造更为美好的未来”^④的观点。这本著作刚一发表,就在美国学术界和公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甚至嘲笑西蒙是“神经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争论的深入,西蒙的支持者越来越多。1981年,他又发表了更富有挑战性的著作《终极的资源》。在这部著作中,西蒙明确指出,从长期看,人口增长会通过生产技术,革新速度,市场形成和政府基建投资等方面的影响,刺激经济的发展^⑤。如麦多斯所著的《增长的极限》一样,西蒙这部著作的发表也在国际学术界和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而且还影响到了美国政府的人口政策。1984年,西蒙和康恩联合出版了具有国际影响的著作《资源丰富的地球:对地球2000年报告的反应》。在这部著作中,他们组织了一批世界知名的专家,针对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地球2000年——给总统的报告》中的每一个问题逐条进行批驳^⑥。这部著作的发表,再次激起了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论争。

学术界的争论使得许多政策制定者也感到无所适从和迷惑不解:人口增长是好还是坏?这一问题是否要优先解决?对计划生育的投入是否能加速经济的发展?为了评估不同流派的观点,同时也为了搞清楚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1983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人口委员会组织了由著名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课题组。该课题组于1986年发表

① 《The Limits to Growth》,D·Meadows,1972.

② 《The Global 2000,Report to the President》,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U.S Department of state,1980.

③ 《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彭松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④ 《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Growth》,J. Simon,1977.

⑤ 《The Ultimate Resources》,J. Simon,1981.

⑥ 《The Resourceful Earth:A Response to Global 2000》,J. Simon and H. Kahn,1984.

的报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政策问题》，集中论述了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讨论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份报告从不同侧面，试图对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做出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因此，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美国人口经济学界的最新成果，也最能代表美国人口经济学界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最新的、最全面的观点。

在报告中，少数学者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增长的重要性要比以前预料的要小。早期的研究认为经济发展的许多因素是一成不变的，低估了整个经济系统对人口增长适应的灵活性。由于人口增长导致了价格的变化，因此，促进了人们为适应这种变化而改变行为的动机。市场对人口增长的反映，不仅是一些小的调整，而且包括一些大的变化，如技术革新的速度和方向，甚至导致社会体制的变化。更进一步说，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并不是经济发展中最至关重要的。相反，人力资本，如教育、技术等才是发展的关键。这份报告并没有创造新的人口——经济模型，而是假定在政策的作用下，使生育率下降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即：(1)人口增长减慢就会提高非再生资源的人均占有，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吗？(2)人口增长减慢就会提高可再生资源的人均占有，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吗？(3)人口增长减慢就会缓解环境污染及环境退化吗？(4)人口增长减慢就会提高工人的资本占有量，从而提高工人的产出和消费吗？(5)减低人口密度会导致降低技术革新的动力，缩小产品和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从而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吗？(6)人口增长减慢就会提高人均教育和健康水平吗？(7)人口增长减慢就能减轻收入的不平等吗？(8)人口增长减慢就能有利于现代经济部门吸收工人，缓解城市膨胀问题吗？^①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报告认为，人口增长会扩大对非再生资源的需求，从而提高非再生资源的价格，而非再生资源价格的提高会刺激人们寻找新的替代资源，促使人们更合理地使用资源。因此，人口增长对非再生资源的影响是有限的，过去关于这一影响的论述有些夸大其辞。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有保留的肯定”，报告认为，人口规模扩大一般会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即边际报酬递减。但是，如果农业研究能跟上，体制调整及时，市场机制健全，那么，人口增长对可再生资源的影响也是可以控制的。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报告认为，人口增长会直接或间接地对环境资源有影响，但环境遭到破坏更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对环境资源缺乏适当的管理和资源本身的公有财产特征。

第四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太明确”，报告认为，从理论上讲，如果人口增长减慢不会改变储蓄率和投资率，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也可能随着人口增长减慢而变化，这要取决于家庭、厂商和政府对于人口增长减慢的反应。

第五个问题的答案是“一分为二”的，报告认为，在制造业中，人口密度与规模经济之间不存在什么关系；而在农业中，人口密度可能带来规模经济。

第六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当明确的肯定”，报告认为，人口增长减慢，家庭规模变小，家长会在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方面有更多的投资，而儿童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状况的改善，意味着将来会有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劳动力队伍。

第七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报告认为，降低人口增长可能会提高劳动力相对其他

^①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Questions》, Working Group on Questions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86.

生产要素的收益,从而减轻不平等的程度。但是,如果生育的下降主要集中在高收入阶层,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变成否定的了。

第八个问题的答案是“有限的肯定”,报告认为,人口增长快会加剧城市问题(如过度拥挤),但造成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向城市居民和城市地区的经济活动提供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吸引的移民过多^①。

报告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夫妇间的生育行为会给整个社会带来负的外部效应吗?答案是肯定的。报告认为,即使计划生育服务能使夫妇得到他们期望的子女数,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生育的数量仍可能大于社会所要求的数量,因此,有必要实行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②在总论中,报告指出,“总的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减慢对经济的发展有利,但要在这种益处做出定量的分析是困难的”。^③

报告还强调指出,“那种对于人口增长危言耸听的或相安无事的论调都是不正确的”^④。从这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不再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看成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而把二者的关系看成是可变的或错综复杂的,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中,人类行为和人类体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已为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所承认^⑤。在美国,有关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讨论仍然没有定论,但二者具有趋向一致的倾向,即两派都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分为二的,而不是绝对的。

人们对人口增长的担忧现在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由经典经济学家对有限的土地承受能力的担忧,转向科尔—胡佛对物质资本重要性的强调,然后又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市场的调节的作用,现在人们又在考虑有限的自然资源问题,这正是过去经典经济学家曾经考虑过的问题。不过,人们现在担忧的主要是再生资源问题。

(作者工作单位:于学军,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黄琳,北京大学经济系)

(上接第53页)城市用水也日趋紧张。如乌鲁木齐解放初城镇人口只有10.5万,工业产值400多万元,目前全市人口已发展到127万人,拥有各类工业企业800多个,已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工业型和消费型城市,相应的城市需水量也逐年成倍增长,1984年的自来水供给量相当于解放初期的近2万倍,但目前每天仍缺自来水3万立方米。由于供水不足,城区自来水普及率不到70%,人均日用水标准89升,只及内地大城市人均用水的59%。

随着水资源的短缺,土地资源的利用面积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并且在已开垦的耕地面积中由于用水、施肥以及耕作等方面的不合理,又造成耕作土壤结构逐渐变坏,使土壤板结,肥力普遍下降。目前全疆绿洲内已有低产板结土530万亩。也由于水资源短缺,降雨少,造成新疆广大地区植被极其稀少,目前新疆森林面积约2600万亩,仅占土地总面积的1.12%,远远低于全国11.5%的覆盖率水平。总之,由于新疆水资源各方面的特点,形成了新疆脆弱的生态环境系统和干旱的绿洲经济特点,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新疆不仅每平方公里的经济密度低,而且每平方公里绿洲的经济密度也不会很高,这就要求人口的增长一定要适应新疆绿洲环境的容量,否则人口对绿洲环境的压力会进一步不断增大,其结果将会使现在已很脆弱的绿洲生态环境更加恶化,从而进一步强化人与资源、环境的恶性循环。(作者工作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① ②③④⑤《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Preston and P. Donaldson, 1986;《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Questions》,Working Group on Questions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86.